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民主直選並非唯一出路

周全浩



上個月，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海外洗錢案被收押看守所，後來民進黨舉行挺扁大會，成功吸引數千名民衆參與。單看陳水扁這八年所牽涉在內的貪污舞弊案，很難相信，在台灣竟然還有民衆如此麻木追隨一個無誠信、無操守可言的人，實在令人費解。

台灣於1996年首次舉行「總統」直選，當年香港主流中文報章鋪天蓋地地盛讚，認為中華民族五千年首次民主選舉，中華民族應感到萬分慶幸。但台灣在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不前，政治鬥爭不息，台灣式的民主選舉，並不如某些評論家所描繪得如此輝煌。

泰軍人干政時有發生

另一邊廂，最近泰國反政府示威者佔領機場，導致港人滯留泰國，有港人批評特區政府無能，未能派出包機接載港人回港。實際上，本港保安局早在上個月二十一日已作出呼籲，港人赴泰應注意人身安全。對於在此期間仍然赴泰度假的人士，實應負起相當部分的責任，既然政府已經宣布當地局勢不穩，何不另擇其他東南亞國家旅行度假呢？這無異於在8號風球下，到大浪灣或石澳、滑浪及游泳的人士，他們為了尋求刺激，不顧自身安全，有些不幸被大浪捲走的人，最後勞煩消防出動蛙人拯救。正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些人都應再三想想，在批評港府無能的時候，自己本身是否都要負起相當部分的責任呢？

數月來，一連串的事件似乎反映出特區的施政愈來愈混亂，政策朝令夕改，如雷曼迷你債券事件及生果金事件等，有評論歸咎於香港缺乏直選，因而特區政府無認受性。筆者對於這類動輒將問題推諉於香港缺乏直選的評論，存有相當大的疑問。

首先，看看台灣地區、菲律賓及泰國，她們的領導人都為直選產生，但當地經濟狀況及人民生活水平，又是否十分理想呢？菲律賓為亞洲首個推行民主直選的國家，若直選真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那為什麼這個國家每年向世界各地「輸出」這麼多的傭工？女傭要拋夫棄子跑到別國工作。再者，泰國的民主選舉是和平，但總理的替換、軍人干政卻常有發生。說到底，直選真的是萬能嗎？

台十多年經濟無生氣

實際上，一個地方繁榮興盛、人民安居樂業與否，和直選無必然關係。曾被標榜為「讓中華民族感到自豪」的台灣直選，先選出了李登輝，後選出了陳水扁，但十多年來，台灣經濟卻如一潭死水，毫無生氣。由此可見，直選並非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

直選真是萬能的嗎？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有好些人不停強調，香港須要民主直選，這些人有考慮過本港的實際情況嗎？還在殖民地政府管治的時候，從來不見有人走出來，向英政府爭取民主直選。難道回歸前，本港沒有直選都可行，而回歸後，沒有直選便萬萬不能嗎？這種忽視民主的做法，是否對「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政府，存有絕對偏見呢？看來掛在政府總部的旗幟一換，卻牽出了眾人的民族自卑與奴才性子。順帶一提，末代港督彭定康每次回港，都引來大小傳媒爭相採訪與市民的熱烈歡迎，看來某些港人的民族自卑感與奴才性子，可真強烈！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兼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美失業大增五警示

馮海寧

美國勞工部日前公布，11月份美國非農就業驚人地減少了53.3萬人，較預期足足多出近20萬，為自1974年以來單月降幅最大的一次。與此同時，當月失業率升至6.7%，為1993年10月以來最高水平。

美國11月份就業人數的驟減，依筆者之見，至少對中國有五個方面的警示：

首先，警示勞動保障部門需要重新審視金融危機的影響，以便拿出更多應對預案。目前，雖然勞動保障部門通過「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降低企業社保交納比例」等辦法來穩定就業，但還有進一步拓寬思路的必要。

其次，警示出口企業要做最壞的打算。就業人數驟減意味著美國居民的收入將要減少，進而會影響到消費。要想不讓中國商品在美國消費市場進一步「縮水」，不僅需要出口企業重新評估美國消費市場，也需要有關方面加大促進產品出口的力度。

第三，警示有關方面要加大刺激內需，並增加強度。擴大內需是今後一段時間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大法寶，但擴大內需的前提是居民有錢消費，有信心消費。

第四，警示主流言論要重視就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從政界到學界，多數人看重保GDP增長，從而忽視了保就業。經濟學家茅於軾就指出，在世界上，做得好的國家，GDP的增長等於於就業的增長。

第五，警示有關方面加大社會保障力度。雖然說，美國就業人數驟減，但由於美國有較為完善的失業保障體系，所以美國失業人員和中國失業人員承擔的壓力卻不同，這需要引起有關方面足夠重視，及時完善失業保障制度。

擴大內需的危機思考

秦曉鷹



解放社會消費力是今天中國擴大內需的根本出路，也是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重要基礎。30年前，中共作為執政黨曾經提出要大力「解放社會生產力」。30年後，中共是否到了要作出大力「解放社會消費力」決策的時候了呢？

三年前，筆者曾寫過一篇拙文，題目是《2008：中國經濟生死一搏》。不過那個時候，主要考慮的是中國加入WTO的過渡期結束後所面臨的挑戰。全然沒有想到今年能出現由於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大震盪給中國帶來的衝擊。

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別是中央政府的4萬億投資計劃和地方政府端出的10多萬億的投資「盤子」，其勃發雄心與魄力不僅震撼國人，也讓世界受到震動。因為有1997年為應對亞洲金融風暴而擴大投資的先例，所以中國此次救市行動還不能算是「創舉」。但從它的空前規模來說，卻是貨真價實的「壯舉」。壯舉者，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必有巨大推动作用！可以預計，以財政為主導的這次大規模投資又會使中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的基礎建設出現一個新局面。

投資應側重民生工程

然而，儘管中國政府擴大內需的決斷和舉措甚莫大焉，但國人世人還是對這項龐大的計劃和具體的意向存在着種種擔憂與疑慮。公衆之所以擔憂，是因為在資金運作過程和項目實施過程中都可能產生巨大的浪費與貪腐；公衆之所以疑慮，是因為對投資的走向是否真正屬於「民生工程」，是否會直接刺激公衆消費缺乏信心。

雖然中央政府為了避免出現貪腐和浪費、避免重複建設、避免高耗能高污染項目的再現，已經在監督、審計、控制、管理方面採取了有系統有組織的行動。但是，在徵地開發、專項招標、工程承包、監理施工等等環節上的大大小小的漏洞，仍然使人們對監管力度和監查水平不敢掉以輕心。

除了貪腐與浪費，中國公衆目前最關心的另一個焦點就是國家投資的走向，即是否能在「民生工程」上給以側重。按照中央的部署，這次新增投資目標中的重點是民生，而重中之重又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各地相繼制定的資金使用項目規劃中，真正的直接的用於民生工程的資金所佔比例往往低於15%。看到這樣的規劃，誰又能夠說，公衆的疑慮是多餘的呢？

與公衆的擔憂與疑慮同時出現的，也是更值得決策者重視的，是一些有良知有真知的經濟學人對中國經濟避免受到大衝擊的深入思考。我把這種思考稱為「危機思考」。在這些危機思考中，主張採取靈活的兩條腿走路戰略的聲音，應特別引起注意。所謂兩條腿走路就是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都要抓；在繼續鼓勵出口的同時，應該大力扶持並做強做大國內市場，千方百計促使那些原以生產出口產品為主但遭遇困境的工廠，轉為以國內市場為主打方向。換句話即是，在當前國際製造業市場動盪受挫並正在出現急劇萎縮的情況下，繼續堅持以外貿出口、希冀利用國際市場（說白了就是依賴歐美消費者）來拉動或維持中國經濟

發展的想法和做法，必須加以調整。曾經帶來豐厚利潤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和具有重商主義色彩的政策意圖都已經不再符合變化了的實際。如果不加以及時調整，如果繼續把希望寄託在國際市場的回暖和世界經濟的復甦上，那就無異於拖垮中國經濟，甚至會在歐美市場這棵樹上「吊死」。

刺激老百姓消費欲望

那麼，政府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刺激老百姓的消費慾望，把銀行中的2萬多億人民幣個人存款拿出來用以消費，從而造成一個充滿活力的龐大的國內市場呢？筆者同意這樣的看法，即應該動用國家財政的力量，把中國從一個非消費型社會轉變為一個消費型的社會。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增」「減」兩個字上使出渾身解數，作足文章、下足工夫。所謂「增」，就是直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全力提高國內公衆的消費能力，讓全體國民有機會真正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所謂「減」，就是減緩或解除中國老百姓的後顧之憂，建立行之有效的醫療、退休、教育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目前，中國的消費總額還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0%，這個數字實在是太低了。事實上，恰恰是收入越低的群體就越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這種傾向與美國成為經濟發展巨大的潛在推動力。但是，如果不解除他們對疾病、養老、子女入學、住房等的擔心，卻希望打開他們視為保命錢的錢袋子，豈非癡人說夢？

中國另一個具有巨大消費潛力的群體就是中等收入階層。目前阻斷這個階層的消費能力施放的主要障礙是中國法律對財產保護上的模糊性。中國個人住房的使用權期限的規定從本質上說只是「半截子」的個人所有。無恆產者無恆心。中等收入階層持幣觀望的心理其實是一種在預期不確定前提下的自我防範意識。只有個人財產得到強有力的保護，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能量才會進一步施放。

凡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消費，是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國內消費水平的長期低迷狀況，意味着這匹「馬」總處在營養不良瘦弱不堪的境地，難道我們就要眼睜睜看着這匹關乎中國福祉的「馬」蹣跚歸西嗎？擴大內需雖然並不能與擴大國內公衆消費完全劃等號，但是國內公衆消費是內需中最主要最最基本最可靠最長效的內容卻是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上海各大商場提前打響年終促銷戰。為了迅速提升人氣和業績，打折的力度也節節攀升。圖為商場推出1折低價吸引顧客。

恐襲威脅印「金磚四國」地位



十一月二十六日孟買發生一連串、高度協調的恐怖襲擊。襲擊者先攻擊鄰近一個主要火車站和一家醫院，將印度警方的注意分散，然後迅速佔領奧布羅伊飯店和泰姬陵飯店兩家頂級酒店。可見，這恐襲是處心積累、有準備的暴力行動，而且襲擊位於孟買市中心造成183死亡。比較起美國「911」中五角大樓所造成的125名傷亡數字，這一次孟買慘劇嚴重程度絕不是國際社會該忽視的個別事件。雖然外界並沒有收到襲擊者的宣言（不代表政府沒有），但從攻擊規模及組織能力來看，這一種恐怖襲擊絕不是由一個新興或小型恐怖分子組織可以策劃。新一輪的恐怖襲擊或許不是個別事件。

虔誠軍恐襲乃是必然

印度政府直言指摘分離分子虔誠軍是幕後的黑手。印度調查人員在本月一日向記者發表講話指，唯一被捕槍手已提供認罪，證明這次行動與巴基斯坦境內好戰團體「虔誠軍」有關，並接受過度虔誠軍為期數月的突擊訓練。虔誠軍在印度其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1989年在巴基斯坦東部成立，虔誠軍是由激進伊斯蘭教薩伊德(Hafiz Mohammad Saeed)設立作為伊斯蘭教中心組織的軍事部門。在克什米爾衝突之中，虔誠軍扮演著反印前線最激烈分子之角色。

早在2001年12月印度國會遭到攻擊，造成10人死亡。那個時候外界已一致認為虔誠軍就是兇手。為了緩和印巴熾熱的局勢，及表示向反恐集團的投誠，巴基斯坦伊斯坦布爾宣布凍結「烏瑪重建」和「虔誠軍」兩個激進組織的資產。烏瑪重建之前並不是廣為人知的組織。不過，因華盛頓指責烏瑪重建向本拉登的「基地」組織提供核子資訊，因此伊斯坦布爾按美國要求將之打擊。對虔誠軍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一來，虔誠軍的主要補給線及不動產都在巴基斯坦，凍結其在巴資產等如要它倒退幾年；二來，虔誠軍因其激進行為而大受強硬派穆斯林政黨支持，硬打擊虔誠軍只會分化國內政體、凝聚激進勢力。從此以後，該組織決定關閉在巴基斯坦的所有辦事處，並將把所有活動限制在克什米爾境內。

奧巴馬競選時的反恐政綱以伊拉克撤兵最為人所知，但這不代表他全盤否定了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略。事實上，他認為阿富汗問題才是反恐的核心，而且美國出師有名。奧巴馬把反恐重點轉向阿富汗並打算向阿富汗增兵2萬。這一增兵計劃除了包括向阿富汗派出地面部隊外，還包括向塔利班中容易動搖的派別舉行談判，以及加強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合作。這想法得到了接受留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的支持，可見其必行之勢。對於虔誠軍來說，重心轉移等如大戰的開始。如果未來是「基地」的上風，虔誠軍必先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從而獲得最多的支持。倘若未來是「基地」的下風，虔誠軍也要散盡了精力，從而獲得最後的認同。無論如何虔誠軍的恐怖襲擊都會是必然之舉。

印度的前途令人悲觀

對於印度的前景，筆者的看法是悲觀的。原因有二：一，這是一次意識層次的衝突。Chaim Kaufman在《種族衝突的可解及不可解》一文中，對意識鬥爭與種族鬥爭作比較，認為衝突原因基於單位的混合，每單位都認為受侵而反撲，並因受整個單位的存亡而偏向攻勢。此種種族衝突，意識之爭雖然可以透過改變信仰而解決，但和平之路需要身心俱疲才可以。一旦信仰與宗教在衝突中拉上關係，這種衝突是各類型鬥爭中最難解的一個。

二，錯誤認知：印度政府倡儀設立聯邦反恐部門，專責恐怖襲擊的預警。不過，在這個全球最多恐怖襲擊的國家，預警往往會被調研員誤讀成小型襲擊，甚至被忽略。是次襲擊美國情報官員警告過印度當局，不過新德里政府將之輕視。其實這種類案例累見不鮮，「911」前華盛頓收到預警，不過當局未有處理；日本襲珍珠港前，盟軍曾收過預警，不過夏威夷陸軍前線人員將之當成當時常常出現的小型襲擊。在一個襲擊繁多的地區，情報的內容與調研員的認知總不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這一次恐怖襲擊反映印度的政治風險重新提升至高位，而且這一波的暴力事件難以解決。從受害者選擇來看，印度的政治風險已經躍上了警界。本年7月底的連環爆炸發生在印度河谷之稱的班加羅爾；這一次襲擊發生在金融重鎮孟買，而且只針對西方富商行動。種種跡象令外國投資者難免對印度有所保留。這波恐襲只會令印度的政治風險危及其金磚四國的地位。

作者為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

台灣媒體發展仍需理想性

吳非



台灣《新新聞》第1134期發表題為《缺機制、沒章法—人才迷宮》的封面故事，雜誌內發表兩篇題為《各方角逐卡位，人事紛爭頻上演——盪好人充斥的馬政府》和《缺機制沒章法——人才迷宮》。這兩篇文章本身的立基點和新聞賣點都沒有任何的問題，但問題在於新聞分析的長遠程度欠缺，因為任何的人才都需要一個培養和實踐的過程。鄧小平曾講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另外，行政單位使用的大量人才基本上都比較中庸，在外界看來也許稱不上人才，但對於行政單位來講螺絲釘和發動機同樣重要。封面故事的結論，平心而論早下了半年，也許半年後再討論都來得及。

《新新聞》作為台灣最具評論影響的雜誌，應該在新聞分析的深度上做文章，要將批評和建言結合，不能夠按照媒體人的喜好，把本來已經複雜的人事問題再加入其他的因素，或者替某一部分人說話。人事問題本來就是中國人中最複雜的問題。

人文辦報與盈利無關

《新新聞》第1135期的封面故事則變為：《飯桶政策保不住人民飯碗——事業怒潮》，其中有兩篇報道非常顯著，分別為《倉促推新案，燒錢玩數字——救失業，馬政府嗶嗶碎碎》和《失業難題，各界獻策——促進人民就業 政府莫圖近功》。雜誌報道中存在的問題是一樣的，雜誌需要把台灣的真正問題寫出來，而不是使用聳動的語言。這些標題常常使我們有個錯覺，就是台灣已經倒退五十年了，其實問題沒有那麼嚴重，比如台灣家庭很多都有車，但大多都是舊車，需要底氣更換，但沒有那麼多錢而已。

媒體對於台灣行政單位的報道大約集中在兩點，政

策快叫急就章，政策慢叫反應慢，是否有恰如其分的呢？沒有，因為按照新聞原則，答案只有兩個，就是急就章和反應慢。如果平日裡電視和報紙經常使用勁爆的語言，台灣民衆受到的基本上都是媒體的騷擾，這樣最終受害的是台灣媒體，是文人辦報的體制。

文人辦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參與政治的一種具體形式體現。在台灣戒嚴時代，文人報紙有個非常不好的習慣，就是在新聞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文人辦報成為非常賺錢的行業，這樣使得台灣報紙的任何轉型和改版都一定和盈利相鏈接。最後報紙出來的新聞往往都集中在媒體霸權的問題，把所有問題都從媒體人的角度想當然，尤其是最近半年，台灣三大報頭版以設計和照片遠遜於香港的報紙。最近筆者在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作報告時，展示了俄羅斯現在的《消息報》、《勞動報》、《論據與事實報》的頭版時，一些老師對於俄羅斯這樣老報紙的頭版變化表示吃驚，甚至頭版好看程度不輸香港的報紙。

媒體不能光追求盈利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蘇衛教授認為，媒體在新聞的選擇上常受到個人、組織、常規、社會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編輯選擇新聞時，需綜合考慮多重因素，其中又以正確性（常規）、合宜性（社會、文化）、價值性（常規）、政策性（組織、社會）、常規性（常規）等五個面向的考慮最為重要。

政大馮建三教授在第六十六期《目擊者》發表了名為《誰僱用誰，這是問題：中國時報的未來》的文章。馮建三教授就指出，科技無言，但經常成為謗過的對象或救贖的英雄。不時有人說，互聯網大發達，人們免費讀報更方便，因此不買報紙。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中國大陸與印度在2003至2007年之間，報紙發行量增加了35%與20%，巴西、巴基斯坦等開發中國家，也是如此。在美國，報量是下跌，是在裁員，但大致報紙都還賺錢

，有些是因為賺百分之十幾都嫌太少，因此出賣報團或減少員工。科技變遷當然會讓報業在內的各種商品市場產生變化，但台灣的情況太離奇。中時是最近的例子。

發掘自身的多元潛力

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台灣媒體在經過戒嚴時代後，近二十年內快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台灣媒體也陷入相當混亂的局面。對於台灣媒體發展的亂像，很多學者、媒體人和官員都希望找出答案。元智大學通識教育部部長王立文教授認為，此時也許沒有辦法就是最好的辦法，如果媒體人此時能夠加強培養自身的多元潛力，新聞傳播學院此時能夠好好思考新聞自由的真諦，善加利用。必須承認，此時台灣可能確實在不順境中，那麼，台灣需要靜下心來，發展全球化下對於台灣有利的因素，這包括傳媒。

按照王立文教授的看法，媒體發展的過程中，新聞自由本身應該屬於新聞傳播專業和政黨、政府體制上協調的問題，如果媒體、政黨和政府能夠相互協調，不要過分把問題集中在新聞自由和媒體盈利上，因為從新聞自由和媒體盈利上來講，永遠沒有能夠兩全其美的方法。

媒體人在大學的培養，應該專業和通識教育兩項並重，將新聞傳播和資訊專業相互結合。這基本上是建立在新聞傳播的專業基礎之上的。在專業上更加深入，這只能增加學生的競爭意識，對於學生的多元思考並沒有太多的益處。

文人辦報是台灣媒體和文化的寶貴財富，但現在卻在全球化和盈利的概念下變得非常被動。媒體必須保持一定的機制，吸納新鮮的媒體人進入媒體，而媒體人絕對不一定來自新聞傳播院校，大陸的媒體人很多都來自中文、歷史、政治、外語等專業，寫社論的還有來自建築專業。讓新鮮媒體人不斷進入媒體，讓老媒體人不斷加強學習，多做深入報道，而不是深度報料，這也許是台灣媒體人的出路。